

# 90后大学生的社会性分化及其潜在后果

田 丰<sup>a, b</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社会学研究所; b. 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 北京 100732)

**摘要:** 随着高校扩招,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迅速跨越到大众化阶段, 不同等级的大学生之间在社会性特征上出现了显著分化, 包括家庭背景、政治参与、文化吸纳、网络使用、社会信任和就业状况等方面。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念追踪调查”2013年调查数据, 借鉴精英理论, 能够分析不同等级高校之间大学生由于精英教育取向和大众教育取向带来的社会性特征差异, 并对高等教育扩张和改革可能产生的潜在后果做出推断。

**关键词:** 高等教育; 90后; 大学生; 精英教育; 社会性分化

**中图分类号:** C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15)01-0100-11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高等教育改革和高校扩招带来每年新招大学生数量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 迅速地把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推进到大众化阶段。

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来看, 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中国社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其承担的社会功能有所改变。高等教育是中国社会精英塑造机制的重要环节。以往所谓的高考一考定终身就说明高等教育的获得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了大学学历, 而且意味着身份的提高和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 也是普通人走向社会精英的前提条件之一。可以说, 在高校扩招之前, 大学是一道分水岭, 高等教育承担着选拔和塑造社会精英的社会功能。在高校扩招之后, 高等教育就是一个学历、一个资格, 而不再是与社会精英紧密联系的区划标准。“文凭贬值”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都说明高等教育不再是社会精英的充要条件。高等教育精英化色彩淡化的背后可能蕴藏着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 过去大众通过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的向上流动, 成为社会精英形成模式也为此而改变。

二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改变了中国人口构成, 社会精英的构成也必然会随之改变。从人口

构成来看, 近年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不断增加, 现在年轻人中每四五个人就有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且随着时间推移,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占同龄人中的比例还将持续增加, 这意味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有可能从少数人变成多数人。按照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 社会精英始终只是社会组织中一小部分人群<sup>[1]</sup>。当高等教育扩招把大学毕业生从在社会中占据较小比例的精英群体转化为占据较大比例的大众群体时, 就很难再称之为精英了。那么, 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如何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众”人群中“诞生”出新的社会精英群体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

在教育稀缺的年代, 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社会解决了两个问题: 谁有资格成为精英和精英由谁组成。但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给社会学者带来了新的研究命题, 原有的精英生产机制被打乱了, 因而必须思考国家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 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国家教育体系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角色和功能非常值得关注。大学的精英教育功能是否还存在? 高等教育体系是不是精英再生产的系统工程? 社会流动的路径是否会因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产生根本性的变革? 在此之前, 必须要了解清楚现在的大学生(包括在校生的和毕业生)的基本特征, 包括他们在学习、就业、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方面的特征, 以及大学生内部的区分。然后, 才可能进

收稿日期: 2014-11-07

作者简介: 田丰(1979—), 男, 安徽蚌埠人, 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从事青年与家庭、社会分层、人口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研究。

一步思索高等教育大众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及与社会精英的生产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试图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解答上述问题。

## 一、基本研究框架

社会精英、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产是社会学期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本文从社会学精英理论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国家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功能变化,力图分析精英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大学生群体产生的社会性差异及其潜在后果。

### (一) 精英主义

精英是指社会中具有超凡能力或者占据有权势职位的一小部分人,这少部分人掌握着大部分权力、财富和文化资源,能够操控社会大众并主导着社会走向。精英最初的提出是为了反对世袭的贵族制度,强调个人能力而不是先赋身份是确定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反对僵化的社会等级结构,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后致式的精英生产模式来打破先赋式身份世袭制度。

早期的精英主义演化出“精英循环论(circulation of elites)”。 “精英循环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任何一个精英集团的统治地位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出现各种不适应性,故而必将被另外一个更加适应当时形势的精英集团所取代。当形势发生变化时,新的精英集团总会取代旧的精英集团成为统治者。帕累托在提出精英循环概念时强调社会中会出现周而复始的一个精英群体被另外一个精英群体所取代,形成了不同精英集团之间的循环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取代模式。莫斯卡在精英集团取代模式之外提出,在旧的精英集团衰落过程中,新的精英集团可以吸纳和同化一部分旧精英集团的成员,并取代旧精英集团,这种模式可以成为吸纳模式。这一观点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革过程中得到了验证,新的精英阶层有相当部分来自旧的统治集团。

米尔斯则进一步认为现有精英集团同样可以吸纳新的精英群体成员,维系其统治地位,也就是精英招募(recruitment of elites)。而精英大学就是现有精英集团吸纳新成员进入上流社会的重要机构。Keller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成就已经取代社会出身成为精英招募的首要原则,这就保证了精英资格不可能实现代际传递,故而不可能出现一个稳固的统治阶级。

布迪厄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在分析教育机制的基础上,使用翔实的实证资料描绘了法国社会中国家精英的演进历程,进

而提出了精英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elites)的观点。在他的眼中,高等教育是既存的社会结构体系利用文凭的神圣性来实现其优势地位代际传递的系统工程,高等教育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子女能够优先、迅速地进入精英阶层,这就是精英再生产。

因而,精英主义和高等教育研究之间有一些契合点:首先,精英主义强调后致成就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与高等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知识和技能不谋而合,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是提高个人能力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高等教育是一个人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路径。其次,无论是取代还是吸纳的循环模式,教育都是精英群体维护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从贵族学校到私立大学都从属和服务于既有社会结构的精英塑造体系。最后,高等教育既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群体维护自身地位的手段,也是孕育新精英群体的摇篮;既有可能像Keller所设想的那样打破既有的社会结构,也有可能像布迪厄所说的成为精英再生产的工具。因此,国家教育体系与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二) 国家教育体系的演进

无论在任何国家,国家教育体系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通常是由国家的教育部来进行集中管理的,因而高等教育政策本质上就是政府政策。欧洲的大学是中产阶级的培训基地,入学者仅限于经过严密筛选的、有学术才能的少数学生精英,这些人寻求的是高层次的专业和职业训练,而不是一般的通识教育。国家在对大学生进行选拔和培养的连贯性筛选计划中,大学生是一个已经证明的精英阶层。当时,欧洲国家精英的高等教育模式主要特征包括:国家资助和控制、集中的规划和政策制定、分别强调高层次学习、专业训练和研究的大学专门化分类<sup>[2]</sup>。

即便是在二战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过程中,大学教育不再是极少数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特有权利,但在主要发达国家仍保留了传统的精英教育体系。在法国,精英教育是由精英大学完成的,比如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在英国,扮演精英教育的公立学校更为明显,比如著顿公学和温切斯特公学,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美国,精英教育主要是由私立大学完成的,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在日本社会精英几乎全是由五所顶级的精英大学毕业的,比如东京大学等。尽管德国并没有传统的精英教育体系,但在2006年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国科学基金会发起的德国大学卓越计划有选择地资助精英大学、精英研究集群和精英研

究生院。在2012年开始的第二轮卓越计划中,有11所大学被选为精英大学、45个精英研究生院和43项精英研究集群得到资助。

尽管精英大学也都开始了看似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招生,但学生必须展现出超凡的能力,通过激烈的竞争方能进入精英大学学习。正如布迪厄详尽分析和解释的那样,所谓能力的竞争,不是基于机会平等原则的,学校也不是单纯的依据能力来选择超凡的学生,而是教育机构社会性选择的过程。比如,精英学校所强调的优秀学生应该具有的特点,如思想开放、学识广博、有教养等等,都是来自中上层家庭考试所具有的,而普通大众家庭里的孩子往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sup>[3]</sup>。由此,精英学校成为中上层维护自己地位的重要教育机构,这一点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丝毫没有减弱,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招生人数比30年代增加了3倍,但其学生数量占同期学生总数的比例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其独特、高级和排外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sup>[4]</sup>。

### (三) 中国高等教育的功能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式”精英的演进路径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红”,强调的是出身和身份;另一个是“专”,强调的是技能和知识;“又红又专”成为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精英招募的基本原则。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提供管理和技术人才,出身成分好的大学生自然而然成为社会精英的主要来源之一。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乱社会精英的选拔机制,作为“文革”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明确提出“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知识分子既作为革命者,又作为革命对象出现在社会公众的视野,知识分子的命运突遭巨变。1966年废除高考,彻底将中国精英招募机制中的“专”给抹去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高等教育再次成为招募社会精英的重要机制<sup>[5]</sup>。

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大量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对“红”的要求有所下降,而“专”反而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匮乏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在高考扩招之前,中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以为国家直接提供合格的精英人才为目标,国家在政策、规划和经费上都严格控制,无论是招生就业,还是专业设置、院系布局,都有国家计划性指令来完成。国家“包产包销”、给予干部身份和城市户口的优待,在当时缺乏向上

流动路径的中国社会中,上大学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转折点。而在百里挑一、淘汰率高的高考制度面前,能够跨过高考这个独木桥、成为一个大学生必须有足够的智力和毅力支撑,大学生本身就是已经证明了的精英群体,故而大学就是中国精英生活和学习的聚集地。而高考扩招之后,大学不再等同于培养社会精英的“圣地”,大学毕业生要想成为社会精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几乎是高考扩招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对高校的等级进行重新地划分。以往高考是按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专科学校来划分;1995年“211”工程启动,着重发展“面向21世纪的100所重点大学”;1998年提出“985”工程,要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这说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以国家主导的模式圈定了一些基础比较好的重点高校作为“精英大学”来发展。由于高校改革的时间较短,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985”和“211”大学作为精英大学与其他学校在育人树才结果上的差异,但“985”和“211”大学承担的精英教育功能是确证无疑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中国国家教育体系同样以国家主导的模式维系着精英教育的传统。但有所不同的是,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在人才匮乏的阶段急需大量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补充到社会精英中,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精英招募,不论出身如何,只要能考上大学,就具有了干部身份,从而成为社会精英的一分子。这些新式精英群体的长期积累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精英阶层,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实现精英的代际传递。因此,现阶段高等教育既有精英招募的功能,又有精英再生产的功能。

### (四)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结合精英理论研究的是国家教育体系和社会精英再生产之间的联系,着眼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包括录取、在校和毕业就业),研究内容综合了学习、生活、就业、文化、态度等诸多方面,试图解答当前国家教育体系在社会精英再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比如精英选拔机制(高考、读研、出国等)、精英培养机制(学习、文化、入党等)和精英发展机制(就业、个人成就)等。通过长期的追踪调查和比较研究,本研究试图解答一些命题,比如国家教育体系如何维系现有的社会结构?大学的精英教育功能是否还存在?社会精英如何产生?社会流动的路径是否会因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当然,这些内容第一论调查中并不可能一应俱全,项目组会在后续研

究中持续跟进,本文也仅仅简略描述了对大学生群体中精英再生产的初步判断。

## 二、文献综述

### (一) 西方精英理论的主要脉络

从历史来看,精英(Elite)概念的提出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为了打破贵族和神职人员霸权,争取民主权利而使用。精英指的是在心智上具有超人一等能力的人,他们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一概念最初被法国的资产阶级用来强调与家庭出身相比,个人成就更应该作为评判社会地位的标准。但在早期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那里,“精英”这个词更多的是作为与“大众”向对应的词汇来使用。

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家们,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不约而同地把精英作为与大众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在从18到19世纪,欧洲地区人口出现了成倍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欧洲还在经历着快速城镇化,大量人口聚集到城镇地区,尤其是在最早出现工业化的地区,如英德。在此背景下,城镇社会中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数量众多,且大量聚集在城镇地区,引发了很多诸如犯罪的社会问题,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针对统治阶级的革命。这引发了统治阶级的恐慌,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人阶级大众聚集在一起会引发社会不稳定?究竟应该由谁来引领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大众社会?

其实,最早提出大众(Mass)社会的并不是精英主义的理论家,而是写出《乌合之众》的勒庞。尽管勒庞没有提出任何与精英、统治阶级相关的概念,却明确地提出,大众是盲从的非理性的,因而大众社会是一个需要领袖的社会。领袖,在莫斯卡的书中进而被明确为统治阶级。

莫斯卡是第一个试图深入分析精英的社会理论家。莫斯卡认为,社会无论如何总会出现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普通大众由于没有财富,很难获得良好的教育和训练资源,也缺乏相应的成长环境和支持,大众群体中只能够有少数具有超群心智的人具备成为统治阶级的品质。大众中会不断地产生新的精英群体,他们试图取代既有的统治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既有统治阶级想要维持统治,需要不断地从大众群体中招募最优秀的新生精英群体进入既有统治阶级;或者是被新生的精英群体给吸纳和同化。

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比莫斯卡的统治阶级更替论更加明确地提出,人类社会普遍会出现社会

精英群体起落和循环的观点。他认为,精英并不一定是统治阶级,精英是一个具有特殊才能且取得非凡成就的人组成,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属于统治阶级,而另外大部分人属于被统治阶级,决定精英循环的关键是:社会如何自发地确定那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取代不具有统治资格的精英处于统治地位。精英循环实质上是具有统治资格精英和不具有统治资格精英之间关系的调整。

米歇尔斯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他把政治生活及政党民主过程中出现的寡头统治称为寡头统治铁律。米歇尔斯认为有组织必然会出现领袖,因为从组织管理来看,当组织中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时,民主就会终结,出现寡头统治。而大众也迫切需要英雄般领袖作为首领来追随。加之,人人都有追逐和掌控权力的天性,任何一个具有超凡智能的领袖轻易不会让度出手里的权力,反而会想方设法地巩固自己的权力。故而,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出现寡头统治就成为一个不可颠覆的定律!

早期三个精英主义理论都提出了与精英循环类似的观点,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特别是精英与统治阶级、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早期精英主义观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后续的研究者们也据此对精英主义导致民主的丧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早期精英主义理论家提出的精英与大众相对立的二分法之外,精英和大众究竟处于何种关系?或者说,处于何种关系的精英和大众才不会导致独裁统治。

当代精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斯和布迪厄。米尔斯认为社会中由于不同的功能产生了不同的部门,比如政治、经济、军事等部门。而在不同部门中都有各自的精英群体,有些重要的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比如大型经济企业、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中的顶层精英群体占据着权利的核心。米尔斯认为由于大公司的兴起导致了权力的集中,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核心部门的精英的利益渐趋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由于利益的相互交织而产生出相互依赖、不可避免的合作关系。米尔斯论证了教育对权力精英的作用,他从权力精英出身的相似性出发,发现大部分权力精英出身于上层社会家庭,尤其是只有上层社会家庭才能进入的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在塑造权力精英群体过程中起到的关键功用。通过只有上层社会家庭才能进入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的选拔和训练,出身等级相似的权力精英群体子女之间的共性被加强了,

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似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并建立了信任关系、共同的阶级意识。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还在新旧精英融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旧精英的子女在那些享有盛誉的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的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相似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规范,进而化解了新旧精英的冲突,融合为一体。

布迪厄同样不认为掌握权力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竞争,他关注的重点是精英的再生产机制。在他对西方教育制度(主要是法国)的批判中始终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垄断符号暴力,将社会不平等的分层体系以中立、合法的面目灌输给学生,从而实现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教育场域表面上具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但实际上是文化再生产和阶级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工具,高等教育沦为了精英获得掠夺权力资格的场域。通过教育场域,布迪厄揭露了西方社会中看似公平,实际上却是延续和再生产不平等的途径和机制。

米尔斯和布迪厄进一步梳理了精英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精英群体虽然出现了内部分化,但是仍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统治阶级仍然是一个单一的精英群体,相似的身份出身、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是权力精英们产生强大内部凝聚力的首要条件。米尔斯和布迪厄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善于用资料从组织和制度层面验证精英之间的合作和转换,重点研究了究竟谁是权力精英,谁在掌控美国社会的权力。而布迪厄则强调统治阶级如何利用自身优势通过教育机构实现权力传递,重点分析现有阶级权力关系和文化的再生产机制。

## (二) 国内的精英研究

在传统中国,精英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以皇权为核心官僚体系中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扎根于乡村社会的乡绅士族。费孝通等把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为“双轨政治”,前者代表的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后者代表的是以宗族势力为主的基层组织自治。“双轨政治”一直延续到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王朝的灭亡,“双轨政治”也走到了尽头,转而出现了地方精英与国家行政合流的趋势。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新的精英阶层恰是国家行政系统和地方士绅相融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既消灭了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也打破了士绅乡土自治的传统,除了国家组织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经济、政治精英阶层<sup>[6]</sup>。新中国又从苏联那里借鉴学习来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得国家行政系统无所不包,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政府,旧式的社会精英伴随着旧的国

家行政系统一起消亡,导致在研究中旧式精英只能作为家庭背景来研究<sup>[7]</sup>,从中也难以看到严格意义上的精英再生产。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精英大学,但上大学的名额基本上被社会中上层所垄断,当时的大学就是旧式精英再生产的重要机构。但工农子女在1949年之后在大学生占据了较大比例,其原因在于大学成为政府利用国家教育体系招募新式精英的重要机构,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改变,比如大学免费、出身照顾、优先招录等。在“文革”时期还实施了特殊的大学生推荐制度,大量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大学生的重要来源。周雪光和侯立仁在研究文革青年时把1977年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恢复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进而改变了文革一代年轻人的命运<sup>[8]</sup>。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高考扩招,中国大学就是招募社会精英的主要机构,高考扮演着推进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考虑到中国高考的惨烈程度以及严进宽出的制度设计,高考扩招之前能够考上大学本身就是已经是成为精英的标志之一。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新中国精英招募的国家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政策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高等教育政策也被看作一场“无声的革命”<sup>[9]</sup>。

国内关于精英研究的另外一个路径主要借鉴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研究成果,围绕着市场化转型前后中国精英群体(主要是国家干部)的代内代际流动,也就是精英群体的接续、流动、循环和再生产展开的。

改革开放之前,在一个全能型的政府体系中,旧式的经济精英被取缔,文化精英被打压,新式的政治精英不但负责国家行政体系的管理,而且掌控着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sup>[10]</sup>。由于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政治精英掌控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只能从国内挖掘技术型官僚,在行政官僚体系之外,吸纳政治上比较可靠、受过良好的教育的技术性官僚来实现的“精英国家化”<sup>[11]</sup>。故此,中国社会长期并行着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两个精英群体,这两个精英群体在国家干部这个共同的政治身份掩护下相互交流,故而都可以认为是政治精英。直到改革开放、市场化转型之后,政治精英一枝独秀的局面才被打破,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崭露头角<sup>[12]</sup>,市场转型前后,精英群体的接续、流动、循环和再生产是学界关注的重点。

吴愈晓将市场化转型前后中国精英群体变动的相关主要研究分为三个研究视角:一是制度主义分析视角,二是结构主义视角,三是机会—流动视角。同时,他也提出了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的

假说。在所有的这些研究中都把教育看作影响中国社会精英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变量。不同的是:(1)在有些研究中接受高等教育是作为一个走向精英的路径来理解,比如获得大学文凭是成为社会精英的一条捷径;(2)有的研究中只是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或者影响因素来使用,比如从政治精英向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转型的过程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精英转化为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可能性更大;(3)在有些研究中只使用高中作为区分教育的指标,这显然与中国这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有所出入,因为只有上大学才能确保人们在身份上转变,使用高中作为指标有可能测量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力上的差异,而非精英形成路径的差异;(4)在既有研究中,把获得大学文凭作为有别于政治忠诚(入党)的精英路径在中国也是不完全准确的,至少在部分年代上大学本身的前提就是政治忠诚、出身良好。

郑辉和李路路则是把精英代内流动的研究总结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萨列里的精英分化理论,并提出了蕴含精英排他机制和精英代际转换机制在内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理论。但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然没有验证他们的精英排他性假设,因为在模型中只是验证了获得较高教育年限的差异,而非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关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在近年来也是热点,与中国精英的再生产也有一定的联系,不过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近年来均处于持续的改革状态,目前尚无法对高考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盖棺定论。

### 三、研究设计

国内精英研究都把大学文凭或者高等教育作为决定精英生产和再生产、影响精英接续流动的重要变量。由于既有研究多属于回溯性的调查数据或者历史资料,调查数据资料上的不足决定了只能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同质性的结果、事件或者影响因素来研究。这里潜藏着两个假设:第一是结果同质性假设。即无论在何时、何地拿到大学文凭,其对塑造社会精英的作用是一样的。这一假设在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尚且可行,而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则难以成立,因为这会忽略了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同层次大学塑造社会精英的差异性。第二是过程类似化假设。因为既有的回溯性调查难以考察大学教育的过程,因而不得不假设任何人接受高等教育时习得知识技能和形成价值态度的过程是一样的,从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对不同精英个体的塑造过程的区别。换句话说,如果把大学比作工厂,把大学生比

作产品,前一个假设是认为所有的高校都是同样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一样的,忽略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异。后一个假设认为同一个工厂生产产品的过程是一样的,从而产生的产品也是一样的,忽略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异。

本研究认为不仅不同大学塑造出来的大学生不同,而且同一所学校塑造出来的大学生之间也不同,在研究设计上充分考虑国家教育体系和社会精英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的差异性。因此,为了确保测量到不同层次大学的差异,本研究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根据现行的国家教育体系的特点,本次调查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2所高校作为调查样本点。调查共获得了7875个有效样本,样本应答率73.9%。

### 四、主要发现

(一)生源分化明显,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几率较低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意味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增大。按照常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同时是一个高等教育摆脱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教育影响,走向多数人的大众教育,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是一个推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但从既有的研究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公平效应<sup>[13]</sup>,反而出现了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减少等令人诟病的现象。其实,重点大学农村生源的减少只是一个缩影,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相对弱势的家庭背景子女在重点大学的比例明显要低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

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农村人是相对城里人的弱势群体。本次调查中有三个指标可以区分“农村人”和“城里人”,分别是上大学前的户籍性质、家庭居住地和父亲的职业。首先,从上大学前的户口性质来看:大学等级越高,农村户籍的学生比例就越低。重点大学上大学前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为42.50%,普通大学比例为50.10%,高职院校为62.51%,呈现出依次升高的特点。其次,从上大学前的家庭居住地(见表1)来看:大学等级越高,上大学前居住在农村的学生比例就越低。重点大学学生居住在农村的比例为33.64%,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比例分别为41.21%和62.51%。重点大学学生上大学前家庭居住在城市的比例为37.90%,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3.96%和15.16%。最后,从父亲的职业来看:大学等级越高,父亲从事农业的比例就越低。重点大学父亲从事农业的学生比例为21.36%,普通大学父亲从事农业的学生比例为31.18%,高职院校父亲从事农

业的学生比例为 43.01%。同时,可以看到父亲职业具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比例在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是依次递减的(见表 2)。

从调查结果来看,无论是户籍性质、家庭居住

地和父亲职业,带有农村背景的孩子在层次最低的高职院校就学的比例最高,而重点大学比例还要明显低于普通大学。这说明在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同等级的高校的生源出现分化,农村孩子上精英大学的可能性与城里孩子比相对较低。

表 1 不同层次高校学生上大学前的居住地

|             | 重点大学  |       | 普通大学  |       | 高职院校  |       |
|-------------|-------|-------|-------|-------|-------|-------|
|             | 频次    | 百分比   | 频次    | 百分比   | 频次    | 百分比   |
| 农村          | 1 002 | 33.64 | 1 273 | 41.21 | 1 047 | 62.51 |
| 乡镇          | 343   | 11.51 | 318   | 10.29 | 193   | 11.52 |
| 县城(包括县级市)   | 499   | 16.75 | 432   | 13.99 | 172   | 10.27 |
| 城市(指县级以上城市) | 1 129 | 37.90 | 1 049 | 33.96 | 254   | 15.16 |
| 其他          | 6     | 0.20  | 17    | 0.55  | 9     | 0.54  |

表 2 不同层次高校学生的父亲职业

|             | 重点大学 |       | 普通大学 |       | 高职院校 |       |
|-------------|------|-------|------|-------|------|-------|
|             | 频次   | 百分比   | 频次   | 百分比   | 频次   | 百分比   |
|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 590  | 19.91 | 341  | 14.20 | 53   | 4.14  |
| 国有/集体企业     | 417  | 14.07 | 269  | 11.20 | 70   | 5.46  |
| 私营企业        | 332  | 11.20 | 273  | 11.37 | 89   | 6.95  |
| 三资企业        | 28   | 0.94  | 30   | 1.25  | 10   | 0.78  |
| 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 | 442  | 14.91 | 305  | 12.70 | 217  | 16.94 |
| 农民、渔民、牧民    | 633  | 21.36 | 749  | 31.18 | 551  | 43.01 |
| 自由职业者       | 173  | 5.84  | 130  | 5.41  | 92   | 7.18  |
| 无固定职业       | 135  | 4.55  | 130  | 5.41  | 109  | 8.51  |
| 军人          | 19   | 0.64  | 14   | 0.58  | 5    | 0.39  |
| 不清楚         | 88   | 2.97  | 59   | 2.46  | 37   | 2.89  |
| 其他(请在横线上注明) | 107  | 3.61  | 102  | 4.25  | 48   | 3.75  |

精英大学中农村孩子比例较低的状况是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子女进入精英大学几率较低的一个典型例证。造成农村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几率低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城乡差异外,还有家庭背景和个人能力差异的影响,本次调查中也确实发现不同等级高校学生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二) 政治参与积极,政治精英招募向重点大学倾斜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精英的形成路径开始多元化,即便是政治精英,背后也越来越强调专业背景,但对精英的政治性要求并没有减弱,在国家机关的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党员。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和党务经历对政治精英晋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变量<sup>[14]</sup>。社会精英

的政治性考察自然也会影响到在校大学生,其实,中国大学除了知识和技能教育之外,也还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尤其是在近些年来出现的“公务员热”的影响下,大学生入党的要求还是很积极的。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的提交过入党申请书的学生比例均超过了一半,分别为 51.86%、62.90% 和 58.69%。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学生对入党态度的差异。在重点大学读书的学生因为能够拿到在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文凭,自身的优势让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还可以选择走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道路。因而,他们对成为政治精英出现一些观望的态度,甚至有一些学生对以功利为目的的入党不屑一顾,不愿意随波逐流。这就造成了重点大

学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反而是最低的。普通大学的大学生没有文凭上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显然不如重点大学的学生,而他们却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考研究生,又保持着成为政治精英的可能。这就使得他们最希望通过拿到“党员身份”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因而他们对入党的态度是最积极的。高职院校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的技术性人才,且大部分高职学生拿到的学历是不符合当前公务员考试要求的。加之高职院校的学制短,走常规的考察入党流程可能导致很多积极分子无法入党。但高职院校的学校小、人数少,组织能力强,因而高职院校学生提交入党申请书比例高与他们的积极组织是分不开的。

提交入党申请书只是入党流程的开始,期间还要经历党课学习、积极分子培养和选拔、预备党员等诸多过程,最终党员比例的多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最近三十年高校大学生党员比例的变化说明,高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承担着招募政治精英的功能,而本次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不同层次高校对政治精英的招募并非是同等待遇的,重点大学党员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大学和高职业院校。重点大学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19.64%和10.00%,普通大学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15.46%和10.28%,高职院校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分别为3.70%和8.48%。总体上呈现出学校等级越高,党员比例越大的特点。

这说明国家教育体系中重点大学承担普遍的、大范围的选拔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功能的同时,高校对政治精英的招募是带有选择性的,更倾向于招募重点大学的学生,从而可能形成从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择优选择政治精英的局面。因此,重点大学尽管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是最低的,但党员比例却是最高的。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社会精英的形成模式更有可能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混合模式。

(三) 中西文化交融,精英学校的西方影视作品更为流行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西方文化大量进入和渗透是发生在90年代之后的事情,比如中国真正的第一部进口大片是在1994年。当代大学生大部分为90后,成长于西方文化大量进入和渗透的年代,自然而然地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文化作品,在他们身上也能够体现出更多中西文化的交融。本次调查试图从音乐和影视作品来探析不同层次高校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及其背后品味差异。

从被调查者喜欢音乐的类型上来看,中国当红流行音乐和欧美流行音乐是最受欢迎的两种音乐类型,在不同层次的学校之间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学生喜欢中国当红流行音乐和喜欢欧美流行音乐的比例较为接近,只相差几个百分点。而高职院校学生喜欢中国当红流行音乐的比例为42.93%,喜欢欧美流行音乐的比例只有20.41%,相差一倍多。其实不仅是西方流行音乐,其他所有的西方音乐类型,高职院校的比例都与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相距甚远。在喜欢中国音乐类型上,高职院校与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大致相当。总体上看,重点大学学生表示喜欢西方音乐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普通大学,最后才是高职院校,这意味着精英大学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程度是最高的,在他们身上能够体现更多的中西文化交融。

但是,需要注意到喜欢的音乐类型设计的是一道多选题,从问卷设计的角度来看,在这种题型下,被调查者能有多种并存的选择,本文分析结果能够说明有中西文化并存的情况,但如果是单选题,即不可能存在并存的状况,中西文化不可以并存时,差异就代表着一种倾向。

喜欢的影视剧类型就是一道单选题,从答题的结果来看,在影视作品的选择方面也有同样的特点。重点大学学生选择日常喜欢看美剧的比例是45.95%,普通大学为38.06%,而高职院校仅为22.30%。重点大学学生选择日常喜欢看国产剧的比例为22.62%,普通大学为24.40%,高职院校比例为39.82%。这说明重点大学的学生在选择上更加青睐于西方影视剧作品,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则更喜欢中国自己的国产剧,在单选题的情况下,精英大学里西方文化占据了优势。

重点大学的学生对中西音乐的喜欢程度是基本相当的,在影视剧的选择上更喜欢西方影视剧,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则选择中国的音乐和影视剧,这些选择性倾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次调查也分别问及了选择音乐和影视剧的原因。通过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重点大学还是高职院校,学生更加喜欢文化作品背后的原因是相似的,比如音乐作品的曲调、歌词的共鸣和符合心情,影视作品角色塑造和情节设计等。不同的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比高职院校的学生更看重作品的编曲和制作精良(17.38%:12.02%),更强调品位(14.70%:11.91%),而高职院校的学生比重点高校的学生更看重作品的流行和时髦,比如注重歌曲的最新流行(12.02%:9.47%),通过影视剧来了解时尚潮流(14.37%:9.47%)。这说明,重点大学的学生体现出社会精英的特质,他们通过追求文化作

品实质和品味,以图区别于其他人群,成为文化消费的领导者,而高职院校学生则是文化消费的追随者,他们试图探求文化消费的流行趋势并跟随这种流行趋势。

(四) 隐现网络鸿沟,精英大学学生更符合网络信息时代特征

20世纪90年代正是互联网在中国从开始走向普及的时代,这个时代催生了信息社会的互联网精英,他们掌握了知识、技术和信息,从而占据了社会精英的位置。90后大学生在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互联网,也能够在学习、生活中使用互联网,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第一批“网络时代”大学生。调查显示,重点大学有75.50%的学生在初中毕业以前就接触了网络,普通大学有68.65%的学生在初中毕业以前就接触了网络,高职院校有70.38%的学生在初中毕业以前就接触了网络。从接触网络的时间来看,互联网几乎是公平给予了每个人同等的机会。

除了第一次接触网络的时间之外,三种层次高校学生使用网络的平均时间和用于网络的平均花费也差异不大。从调查结果来看,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平均每天上网时间分别为5.5个小时、5.2个小时和5.3个小时,中位数均为4个小时,差异不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平均每月上网的花费分别为79.2元、67.4元和79.5元,中位数均为50元。

从调查结果来看,不同层次高校的学生第一次接触网络的时间、平均每天使用网络事件和平均每月网络费用差异都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不存在,因为真正的“数字鸿沟”是在信息搜集、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环节。故而,本次调查不仅调查了接触网络的情况,而且记录了使用网络的具体内容,试图从网络使用的具体内容上分析不同层次高校学习的差异。

近年来,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s Site)兴起是互联网发展的亮点之一,比如:美国的Facebook,中国的人人网等。社交网络是建立在真实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基础之上,提供社会交往互动的互联网服务模式。从对社交网络的使用情况来看,重点大学使用过的学生比例为84.43%,普通大学使用过的学生比例为63.22%,重点大学使用过的学生比例为26.71%,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别。造成差别的原因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社交网络只是一个技术构架,技术构架之上的信息构架是由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好友来形成的,也就是说社交网络的信息和知识结构取决于真实社会网络中好友信息和知识结构。如果一个人社会网络中好友的知识含金量高,他的信息含

量就高,社交网络(好友圈)对他的价值越大,黏度越强,也就更有可能使用。假设这种理论成立,那么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使用社交网络的差异是由于他们网络所能交换的信息价值程度来决定的,重点大学日常交往的社会网络能够提供知识和信息的价值最高,所以他们最有可能使用;而高职院校日常交往的社会网络提供的知识和信息价值最低,所以他们使用的可能性最低。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信息传送速度越来越快,网络逐渐成为不同社会舆论的集散地,而微博的出现则为网络舆论集散地提供了一个出口,微博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调查发现,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学生经常使用微博的比例远远高于高职院校,比例分别为28.35%、32.43%和14.71%。这说明高职院校在网络舆论场的参与率要低于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其原因可能是高职院校的学生不关心社会舆论,也不积极参与社会舆论的讨论,从而丧失了网络话语权。而社会精英则是控制着舆论场,掌握着话语权,积极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群,这一点与精英大学的学生表现相近。

(五) 逆向信任关系,精英大学学生对官方组织和媒体不信任程度更高

中国经济改革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政治改革始终未能迈出关键的一步,这导致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边界不清,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公权力滥用的现象。公权力的滥用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有人将此称为“塔西佗陷阱”。所谓的“塔西佗陷阱”是指当公权力部门由于对公共事件处理不力、不公时,其公信力会遭遇危机,从而导致无论公权力部门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大众理解为说谎,从而遭遇公信力进一步丧失的危机。而当代大学生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政府公信力趋于下降的时代,因此,社会信任成为社会态度的重要方面。本次调查重点关注了他们的社会信任度,包括对机构的信任度和对渠道的信任度。

对机构信任度的测量区分为官方机构、社会机构(民间机构和境外机构)、企业机构等,从调查结果来看,重点大学对官方机构的信任度要低于普通大学,高职院校对官方机构的信任度最高,这一点在近两年备受争议的红十字会上表现最为强烈,重点大学有37.11%的学生表示很信任或比较信任,普通大学有38.87%的学生表示很信任或者比较信任,而高职院校表示很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却高达57.83%。反之,重点大学对社会机构的信任度却高于普通大学和高职院校,

比如对民间慈善组织和境外慈善组织表示很信任和比较信任的重点大学学生比例分别为69.81%和51.94%,普通大学学生比例分别为65.54%和49.76%,高职院校学生比例分别为60.06%和45.81%。对社会机构的信任度是按照学校等级依次递减的。

大学生对渠道的信任度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趋势,总体上而言,大学生的对官方公告、主流媒体的信任程度要高于自媒体和网络论坛。唯一在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出现明显差异的是对境外主流媒体的信任度,重点大学有74.02%的学生表示很信任或者比较信任,普通大学有72.98%的学生表示很信任或比较信任,高职院校有62.05%的学生表示很信任或比较信任。这种差异的出现既有可能与不同层次高校网络信息采集能力有关,BBC、《纽约时报》等往往需要“翻墙”才能浏览,故而有些高职院校学生对这些媒体报道接触还是比较少的,对境外主流媒体的认知多来自其他媒体的转载,信任与否也就无从谈起。而重点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接触到境外主流媒体,从中也看到一些差异,作为社会精英的后备,他们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在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情况下,更多地选择信赖境外媒体。这可能是高校学生对境外主流媒体信任度差异的原因。

(六) 就业分层明显,精英学校毕业生就业满意率高

结合网络调查和电话调查的结果,能够计算出该时点的就业率和失业率。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计算就业率和失业率的方法与教育部的方法并不一致,那些没有就业意愿(创业和复习考研等)和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考研、出国等)的毕业生被排除在就业率和失业率的计算范围之外。根据这一标准能够计算出,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0.5%,失业率为19.5%;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7.7%,失业率22.3%;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9%;失业率为8.1%<sup>[15]</sup>。如果只从就业率来看,高职院校的就业率还占有优势,重点大学次之,最差的是普通大学,就业并不简单的是就业率,还要看就业质量,比如就业单位、初职收入和就业满意度。

由于中国市场化并不彻底,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有着其他就业单位难以比拟的优势,比如福利待遇和隐性收入等等,从而使得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成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热门单位。从调查结果来看,重点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单位选择上占据了明显优势,进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9.20%和32.52%,普通大学的比例为5.41%和20.95%,高职院校的比例为

0.92%和11.06%。而对进入相对不利的私营企业比例来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比例高达61.29%,是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两倍。除了单位类型之外,职业收入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调查数据分析表明,重点大学毕业生在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为4739.9元,收入中位数为3500元;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3491.5元,收入中位数为3000元,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2232.5元,收入中位数为2000元。从初职收入来看,重点高校要高于普通高校,而普通高校高于高职院校。

此外,从就业满意度来看,重点大学毕业生表示对初职就业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的比例分别为14.72%和71.17%,普通大学毕业生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的比例分别为8.11%和64.19%,高职院校毕业生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的比例分别为8.76%和55.76%。可见,重点大学毕业生对初职的满意度最高,也反映出他们在就业质量上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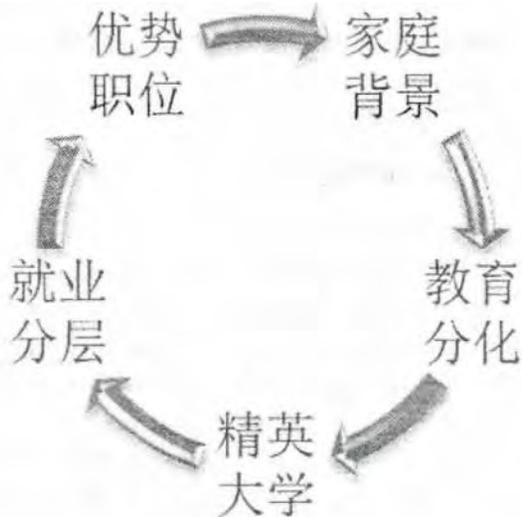
因此,毕业生就业情况反映出重点大学的就业优势,他们培养的学生能够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优质的工作岗位,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来看,精英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机构,而这些社会精英在毕业后理所当然地要占据有利竞争岗位,必然会出现就业层次上的分化。本次调查则验证了这一观点,重点大学培养毕业生距离当前社会中公认的精英职位距离更近,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未来的社会精英。而高职院校的学生虽然有较高的就业率,但是他们大多数进入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民营企业,在单位类型和收入水平上与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有明显的差距。

## 五、中国精英生产的讨论

随着大学进入90后时代,一个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的群体逐渐成长起来,他们虽然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增加了,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再完全属于精英教育的大学生活。本文的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改革,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等级划分对90后大学生的社会性分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90后大学生社会性分化的背后是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已经难以承担作为社会流动路径的作用。就目前来看,“985”、“211”大学能否发挥类似于西方社会精英大学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但本应推进社会公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却没有带来真正的社会公平,本次调查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和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子女进入高等大学的可能性明显较低,这就意味着当前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从入学选拔环节就出现了有

利于中上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分化。不平等分化同样体现在就业环节,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够找到具有优势地位和良好收入水平的工作,而普通大学就业率偏低,高职院校虽然就业率高,但就业质量明显较差。至此,可以简单地勾勒出高等教育体系在社会精英再生产系统中的位置(见下图),国家教育体系确实发挥了维护当前中上阶层利益的作用。以“985”、“211”重点大学为代表的精英大学在精英再生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发挥着区分的作用,把中下阶层的子女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又发挥着区隔的作用,让中上阶层家庭子女拿着精英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

精英循环论认为,新的社会精英有可能从既有的社会体制中繁衍出来,从而形成新旧接替的循环。本次调查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启示,比如精英大学学生虽然是国家教育体系培养的接班人,但他们对官方机构的信任程度是最低的,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现状存有的不满情绪也是最多的,有可能就是接替旧精英的潜在力量。同时,大学分化既改变了社会流动模式,也改变了未来的社会结构。比如,农村家庭的子女在高职院校比例最高,他们不再可能重复上一代农家子弟通过上大学实现直接向社会精英阶层的跨越,而可能是社会结构中形成一个职业技术阶层,间接地向社会精英阶层过渡。当然,这些推论还需要更加长期的观察研究来加以证实。



中国精英循环与国家教育体系

本研究是一项针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追踪调查研究,在研究中必须意识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教育阶段,国家教育体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变化关系。当前,国家高等教育体

系不再是贯彻精英教育的思路,在放宽了入学要求的同时也降低了培养精英的“成材率”,职业技能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社会不应该纠结于诸如“文凭贬值”、大学生就业难等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应该重点关注教育机会的均等,尤其是如何调整国家政策和制度,让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获得入学机会。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M].任军锋,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2] 休·戴维斯·格拉汉姆,南希·戴蒙德.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战后年代的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 [3] 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4] 米切尔·哈特曼.精英与权力[M].霍艳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5] 杨凤城.关于“又红又专”问题的历史评价[J].中共党史研究,1997(4).
- [6] 魏光奇.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 [7] 吴愈晓.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社会学研究,2010(2).
- [8] 周雪光,侯立仁.文革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M]//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9] 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
- [10] 吴忠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J].文史哲,2008(3).
- [11] 余洋.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J].社会,2010(6).
- [12] 刘宁宁.中国新的社会分层和新的地方精英的崛起[J].国外理论动态,2007(10).
- [13]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10(3).
- [14] 周雪光,图玛·摩恩.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层动态分析:1949—1993年的中国城市状况[M]//燕杰,等.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15] 李春玲.“最难就业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基于12所高校毕业生追踪调查[M]//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杨大威]